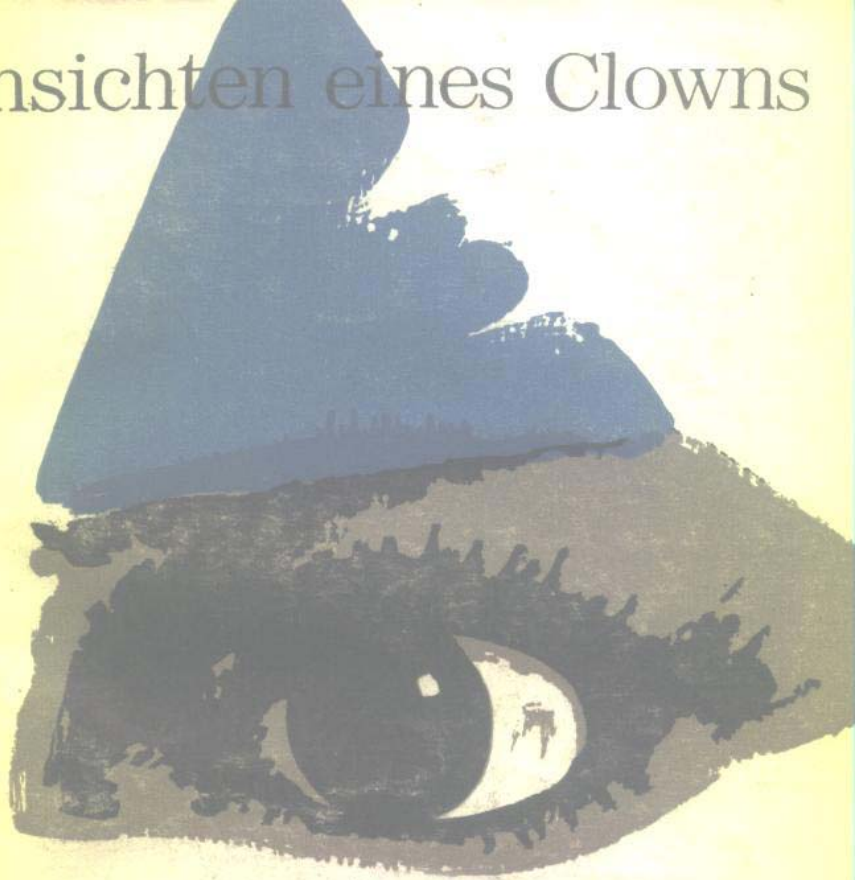


Ansichten eines Clowns



# 小丑汉斯

[德]海因利希·伯尔著 余秉楠译

# 小丑汉斯

〔德〕海因利希·伯尔著

余秉楠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Heinrich Böll  
**ANSICHTEN EINES CLOWNS**

本书根据德慕尼黑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出版公司1975年版本译出

**小丑汉斯**

[德] 海因利希·伯尔著

余秉楠译

责任编辑：梅良朋

唐荫荪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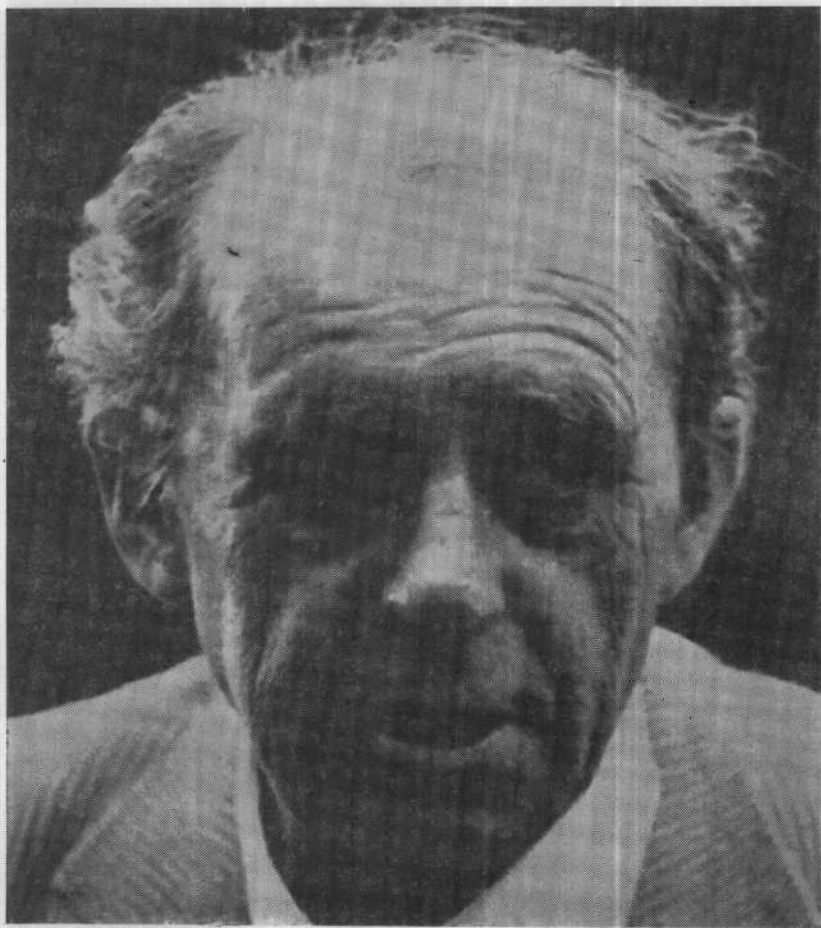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黔阳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87,000 印张：9.375 印数：1—34,600

统一书号：10109·1786 定价：0.89元



Henri Piou

# 1

**当**我抵达波恩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强制自己，让我的行为不致象机械人那样死板。五年多的旅途生活使我养成了这种程序化的习惯：走下站台台阶，走上站台台阶，放下旅行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火车票，提起旅行袋，出示车票，走近报摊，买几张晚报，到外面招呼出租汽车。五年来我几乎天天从某地出发来到某地，早晨我走上并走下站台台阶，下午又走下再走上站台台阶，叫来出租汽车，在我的外衣口袋里寻找钞票付给司机，到书报亭买几张晚报，同时在内心的一角自我品尝这种经磨练而得的情性行为的滋味。自从玛丽离开我，要嫁给天主教徒齐夫内尔以后，我越发懒散成性了，这种不费心神的死板动作变得更加机械。从火车站到旅馆，从旅馆到火车站，出租汽车的里程表随时计下这不断变化的行程，并显示出票价：两马克，三马克，到四马克五十分尼……。自从玛丽出走后，我有时会变得颠三倒四，把旅馆和火车站互相混淆起来，有时在旅馆的住宿登记台前烦躁不安地寻找我的火车票，或者向检票口

2057/62

的检票员询问我的房间号码。随便什么事情，哪怕是命中注定的，都会使我想起我那倒霉的职业和境遇。我是一个小丑，官方的职业称呼是滑稽演员。不信宗教，对教会没有纳税义务，今年二十七岁。《到达和出发》是我的节目之一，是一幕“几乎太”长的哑剧，到剧末时弄得观众对到达和出发这两个概念都模糊不清了。这个节目我都是在火车上再三思考过的（它有六百多次往返过程，每次是来，还是去，当然在我的头脑里是必须记得清清楚楚的）。因此，我有时候也难免产生幻觉：闯进某家旅馆查阅火车时刻表，匆忙跑上楼梯或跑下楼梯，生怕误了我的那趟火车，其实这时我应做的事是进我的房间去做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数旅馆的人都认识我，这五年之内我象推磨一样生活，很少有过变动，养成了一种富有节奏的、人们都乐于接受的生活方式。此外我的代理人为我操办一切，他深知我的脾性，很少和我发生摩擦。他所说的那种“艺术家灵感”，在这里完全得到了尊重，只要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种美好舒适的气氛就立刻把我包围起来：漂亮的花瓶里插上了鲜花，我刚刚撤下大衣，把鞋子（我讨厌鞋子）往屋角里一甩，发出砰砰的响声，一位美丽的女郎就会送来咖啡和法国白兰地酒，给我准备好洗澡水。我走进浴室，绿色的皂片散发出芳香，使人感到宁静。我躺在浴缸里读报消遣，自在轻松，有时看六张，至少三张。我还用适度的男中音唱着学生时代记住的赞美诗：颂神曲和圣歌等。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热衷于赶战后时髦，为了对宗教派别之间的和解表示诚

意，把我送到一个天主教教会学校去读书。我自己并不相信宗教，从来不去教堂做祈祷，唱赞美诗和圣神曲对我来说只是出于治疗上的动机：它能够帮我神奇地解除两种痛苦，因为我从出生以来就有忧郁症和头痛病。自从玛丽投入那个天主教徒的怀抱以后（尽管玛丽本来就是天主教徒，但我觉得还是这样说似乎确切些），这两种病痛就越来越厉害了，甚至连赞美诗和颂神曲——曾最能为我镇痛的灵丹妙药，也对我失去了疗效。只有一种短暂的特效药：酒精；有一种对我有长期疗效的妙方：玛丽。玛丽离开了我。一个小丑，正在变成酒鬼，其堕落之速，比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泥瓦匠从房顶摔下来还要快。

如果我喝醉了，在登台演出的时候，那些只有认真才能做得恰到好处的动作就做不准确了。而且犯了一个给小丑最丢脸的错误：对失败的自我嘲笑。一种可怕的自暴自弃感猛烈地侵袭着我。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临演前到走上舞台的一刹那间，恐惧感与时俱增（通常我必须被推上舞台）。这时批评家们报之以所谓“发人深省的耻笑”，“在这后面可以听到有一颗心在剧烈跳动”。没有什么比这绝望的奚落，更能使我在演出时变成一个没有知觉的木偶。一旦断了拉线，我这木偶便现了原形，那就更糟了。这也许和修道士在冥思苦想的情形差不多。玛丽随身带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文学书籍，留在我记忆中的是“空幻”和“虚无”这样的字眼。

这三个星期以来我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带着虚假的信心走上舞台，它的后果表明，这比一个懒惰的学生在接到成绩

单时还在幻想侥幸取胜的情形来得更快。花半年时间做梦是很长的。从那时候起的三个星期以后，我的房间里没有了鲜花，从第二个月的月中开始没有了附设浴室的房间，第三个月的月初，薪金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从火车站回来的出租汽车费却增加到了七马克。喝不上白兰地，代替它的只有烧酒。也失掉了去杂耍场演出的机会。我只能在那些昏暗的大厅里演出，在这里活动的是一些奇特的社团。我走上舞台时，照明糟透了，不过我再也没有做过准确无误的动作，只要扮演一些鬼脸就行了。我在火车站、邮政局、税务所是为他们的庆功会助兴；给天主教的家庭主妇或者基督教的女护士们的表演某些逗乐的余兴节目。那些喝啤酒的联邦军官们经常操练，我对他们的操练教程的末尾十分欣赏。当我表演一个叫做《国防部》的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该笑或是不该笑。昨天，在波鸿<sup>①</sup>为那些年轻人表演模仿卓别林的时候，我滑倒在地，无法再站立起来表演。这时没有嘲弄嘘哄，只有一片怜悯的低语声，幕布终于在我的面前落下，我一瘸一拐地迅速离开舞台，收拾起我的服饰杂物，顾不得卸装就乘车回到我的住所。这时突然暴发一阵骇人的怒骂声，我的女房东拒不替我支付出租汽车费。我只好好言劝慰恼怒的司机，把我的电动剃须刀不是作为典押而是当作车费给了他。他还是够友好的，找还我一盒开过封的雪茄和二马克现金。我把脱下的衣服扔在没有整理

---

① 波鸿：德国西部位于北莱茵河旁的城名。

——译注



过的床上，喝着酒瓶里的剩酒，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觉得完全消除了忧郁症和头痛病。我躺在床上，如同我有时候所希望的那样：我总有那么一天会醉若烂泥，躺在阴沟里面。我本来打算用一件衬衣去换一瓶烧酒，只是由于这种交换的手续太复杂，才放弃了这一举动。我睡得好极了，十分安稳，梦见沉重的舞台幕布象一块柔软、厚实的殓尸布落到我的身上，使我感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幸福。我殷切地追求睡眠和梦幻，害怕醒过来的情景：我的脸上还涂着化妆油彩，右膝盖渐渐肿胀起来，塑料盘里盛着粗劣的早点，咖啡壶旁放着我的代理人打来的电报：

“科不林士<sup>①</sup>和马因兹<sup>②</sup>取消演出，夜晚与波恩通话。波恩。措内莱尔。”

后来，一位主办人打来了电话，通过这次电话我才知道，他是基督教教会学校的董事。

“我是科斯特尔特，”他在电话中说话的口气象对下属一样冰冷，“施尼尔先生，关于您的酬金我们还必须澄清一下。”

“请您说吧，”我说，“这没有问题。”

“是吗？”他说。

我沉默着。当他继续往下说的时候，他那轻蔑的冷淡变成了赤裸裸的虐待狂。

---

① 科不林士：德国西部地区的城名。

② 马因兹：德国黑森地区的城名。

“我们决定给一个小丑的酬金是一百马克，虽然他过去是值二百马克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显然是给我机会，让我发火，但是我仍然保持沉默，于是他凶相毕露地说：

“我掌管着一个公益团体，我的良心禁止我付给一个小丑一百马克，给他二十马克就够了，别人同样会说我是慷慨大方的。”

我觉得这没有理由打断我的沉默。我点燃了一支香烟，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劣等的咖啡，听见他喘着粗气。他说：

“您还在听吗？”

我说：“我听着呢。”

我等候着。沉默是一件有力的武器，在学生时代，每当我站在校长或者全班同学的面前怕得发抖时，我总是以坚定的沉默来对付。我要让这位基督教的科斯特尔特先生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出一身老汗。要想他分担一点我的痛苦，那是微乎其微的，但他同情自己倒是足足有余了。他终于嘟嘟囔囔地说：

“施尼尔先生，您提一个方案吧。”

“您仔细听着，科斯特尔特先生，”我说，“我的方案是这样：您乘一辆出租汽车，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到波恩的头等车厢的车票，再给我买一瓶烧酒，到我旅馆里来，替我付清包括小费在内的账单，再用一个信封装上我乘出租汽车到火车站去的车费。此外，拿出您那基督教徒的良心，无偿地把我的行李运到波恩去。您同意吗？”

他估算着，咳嗽了一声，说：“但我只想付给您五十马克。”

“好的，”我说，“您乘电车来好了，这样，您花钱更少，比五十马克更便宜。同意吗？”

他又估算了一会儿，说：“您不能把行李放在出租汽车里带走吗？”

“不，”我说，“我受伤了，不能随身带走。”

显然，他那基督教徒的良心开始激烈地活动起来了。

“施尼尔先生，”他温和地说，“我感到很抱歉，我……。”

“好了，科斯特尔特先生，”我说，“我感到幸福，我能够为基督事业节省四百到六百五十马克。”

我按了一下电话机的双簧座，把听筒放在电话机旁。我知道他这种人，还会再打电话来的，无聊透顶地折磨和捉弄人。别理他，让他独自按照他的良心去挖他的鼻孔好了。我很后悔。我忘了告诉他，我不仅患有忧郁症和头痛病，还有一种别的什么异感，或许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功能：能够从电话里嗅到对方的气味，我嗅到了从科斯特尔特身上散发出来的紫罗兰香水的甜蜜香味。我必须起床，刷牙。我把剩下的一点烧酒倒进喉咙里，使劲擦掉化妆油彩，重新倒在床上，想着玛丽，想着那些基督教徒，想着那些天主教徒，想着我的未来。我还想到了阴沟，终有一天我会躺在那里。对于一个小丑，当他年近半百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阴沟或者宫殿。我不相信会有宫殿，无论如何我离五十岁还有二十二年

多。无情的事实是科不林士和马因兹拒绝我演出，这就是措内莱尔所说的“第一级警报”，这倒使我忘记提到我本人另一种特性：我已懒散成性，麻木不仁了。在波恩也有阴沟，谁能料到我会活到五十岁呢？我想念玛丽，想起了她的声音，她的酥胸，她的手，她的头发，她的举止以及所有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情。我也想起了想要和她结婚的齐夫内尔。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真可说是亲密无间。当我们长大成人重新相遇时，竟不知道彼此应该称呼你还是您了，各自窘迫地招呼对方坐下，只要我们一见面，就很亲热，但又显得十分尴尬。我不明白，玛丽怎么偏偏会和他私奔。但是，也许是我从来没有理解过玛丽吧。

我被科斯特尔特的到来激怒了，因为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打断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他象一只狗那样抓挠着房门，说：

“施尼尔先生，您必须听我说，您需要请一位医生吗？”

“让我安静点！”我大声喊着，“您把信封从门下面塞进来，然后滚回您的家去。”

他把信封从门下面塞进来，我下床拾起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从波鸿到波恩的二等车厢车票和刚够付出租汽车的钱：六马克五十分尼。我本来指望，他至少会给我十马克的整数，而且我已经划算好，如果我把头等车厢车票退掉，换成二等车厢车票，我还能赚得大约五马克。

“一切都齐了吗？”他在外面喊叫。

“好，”我说，“现在，您滚开吧，您这个可恶的基督

教畜牲。”

“但是请您允许我。”他说。

我怒吼起来：“滚开！”

这才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听到了走下楼梯的响声。这个世界的普通儿女不仅比上帝沐浴的儿女更聪明，而且也更有女性和更加宽宏大量。我乘电车去火车站，省下一点钱买烧酒和香烟。女房东在我的食宿费用账单上添进了一笔电报费，这是我在晚上打给被恩莫妮卡·茜尔弗斯的，这笔费用是科斯特尔特拒绝支付的。因此，我的钱无疑已不够支付到火车站去的出租汽车费了。在我知道科不林士拒绝我演出以前，我已经发出了这份电报。他们抢先一步取消了演出，这是件使我感到恼火的事。如果我先发一个“由于膝盖严重受伤不可能演出”的电报，这对于我也许更体面些。算了，好在我已经给莫妮卡发了电报：“请您安顿好明天的住宿，衷心问候您。汉斯。”

## 2

**我**在波恩的经历全然不同。我从来没有在那里演出过。我住在波恩，但是我叫出租汽车从来不是送我去旅馆，而是回家。我必须说明是我们，是玛丽和我。在这幢房子里没有一位可能被我误认为是铁路职员的看门人。这幢我在一年中只住三、四星期的楼房，对于我比任何旅馆还要陌生。我必须克制自己别在波恩火车站前面下意识地举手招呼出租汽车，但这手势已成条件反射，险些使我狼狈不堪，因为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唯一的一马克了。我站在火车站前面的露天台阶上，摸了摸钥匙：大门、房门和写字台的钥匙，在写字台里我或许能找到一把自行车钥匙。我早就想编一个名叫钥匙的哑剧，我设想在演出这个节目时它们慢慢融化。

我没有钱乘出租汽车，在我的生活中我第一次感到真的需要车：我的膝盖肿胀，我一瘸一拐艰难地越过车站广场，朝邮政大街走去。从火车站到我们的住房只有两分钟的路程，但我觉得它好像是永无止境似的。我靠在一只自动售香

烟机的柜子上，向这幢其中有我的祖父赠送给我一个套间的楼房瞟了一眼，它是一幢别致而互相衔接、各成单元的楼房，并且有着色泽柔和的阳台围壁，五层的楼房，色调各异，美观大方，第五层楼全都是褐色的，我就住在这一层。

难道这是我演出的一个节目吗？把钥匙捅进大门的锁孔里，它没有溶化，我也没有感到惊奇。打开电梯门，在标着“5”的按钮上按了一下，一阵柔和的嘎吱声，电梯载着我徐徐上升。透过狭长的电梯窗户可以看见一节走廊。从走廊上的窗户望出去，纪念碑的背影、广场、教堂尽收眼底。接着便是黑色的断层，混凝土的楼板。这种情形重复了三次，只是视角略有不同。到第四次的时候就只看见广场和教堂了。把钥匙捅进五层楼门的锁孔，用不着大惊小怪，门自然开了。

在我的套间里一切都是褐色的：门、墙面、壁橱。一位穿褐色晨衣的女子躺在睡椅里将是非常相配的。也许我可以有这么一个女人。只是，我不仅忍受着忧郁症、头痛病的折磨，感觉麻木的折磨，能从电话中闻到气味的特异嗅觉也只能给我带来痛苦，而我感到最可怕的是我始终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信念。一生中只有一个女人能与我做男人和女人一起做的事，她就是玛丽。自从她离开我以后，我生活得象个修道士，只是，我并不是个修道士。我仔细考虑过，我是否应当乘车到农村去，聆听母校那个神父的忠告，但是所有这些家伙都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夫多妻制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十分强烈地保护一夫一妻制）。在他们看来我一定是个怪物。他们的忠告无非是极乐世界的暗示，在这个极乐世界里，象

他们相信的那样，爱情是可以买卖的。在基督教徒那里我感到更加震惊，象科斯特尔特这样的人，他的确很成功，使我惊叹不止；但是在天主教徒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会使我感到惊讶了。我曾对天主教教义抱有很大的同情，甚至在四年前玛丽就第一次把我带进了“进步的天主教徒圈子”，她把我介绍给一位聪明能干的天主教徒，当然她有她的隐情，期望我有一天会信仰天主教（这种隐情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有的）。我初到这个圈子里，感到很可怕。那时我的小丑生涯正处在十分艰难的发展阶段，我还不到二十二岁，整天进行着紧张的练习。这天晚上我觉得非常快活，也累得要命，期待着一个愉快的聚会，有大量的上等葡萄酒，珍馐美味，也许还有舞会（那时我们一贫如洗，既买不起酒，也买不起上等食品）。谁知代替这一切的只是劣等葡萄酒。那天晚上的情景大体上是这样，我向一个社会学高等学院的令人厌倦的教授作自我介绍，情绪很紧张，而且是一种多余的和不自然的紧张。首先他们一起进行祈祷，在整个时间里我不知道把我的手和脸往那里放才好。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该带一个无神论者进来的。他们祈祷的也不仅仅是上帝或者圣母玛丽亚（就这些已经使我够狼狈的了，受基督教的教育我已经做过各种形式的个人祈祷）。也不尽然，首先是金开尔执笔编的一段祷词，很有条理：“请给我们维护传统事物和支持进步事物以相同的力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便是晚间课题《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贫穷》。这是我生活中最痛苦的夜晚之一。我简直不能相信，宗教的社交竟然必须如



此费劲。我知道，信仰宗教并不那么容易。肉体的复活和永恒的生命，玛丽常常给我朗诵这段圣经，要相信这一切，实在是太困难了。后来我甚至读过基尔干加德<sup>①</sup>的书籍（它对于一个正在成为小丑的人是一本有用的教材），虽则也难理解，但并不过于乏味，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拿毕加索和克莱<sup>②</sup>的绘画去绣制桌布。那天晚上我看得出来，尽管这些进步的天主教徒把托马斯<sup>③</sup>、弗朗兹<sup>④</sup>、博纳文图拉和利奥<sup>⑤</sup>十三世当作遮羞布围在自己的胸前，但仍然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丑恶，因为没有一个人（除了我以外）每月收入在一千五百马克以下的人在场。后来，他们装出了一副玩世不恭和假绅士的派头，使自己陷入了狼狈不堪的境地，只有齐夫内尔例外，整个这件事情痛苦地折磨着他，请我给了他一支香烟。这是他有生以来抽的第一支香烟，他抽得相当笨拙，我注意到，他很高兴浓烟遮掩着他的面孔。我痛苦极了，那是因为玛丽脸色苍白、全身颤抖地坐在那里，听金开尔谈某人的趣闻小史，说这个人每月挣五百马克时，他很会理财；当他挣得一千马克时，日子倒不好过了；挣得二千马克时，简直陷入了困境；最后，挣得三千马克时，他觉得花钱能随心愿了。他用他的经验说明了这样一条哲理：每月挣五百马

① 基尔干加德（1813—1855），丹麦哲学家。

② 克莱（1879—1940），德国抽象派画家。

③ 托马斯：基督教徒。

④ 弗朗兹（1182—1226），基督教弗朗西斯宗派的祖师。

⑤ 利奥，教皇八世的姓。